

茅海建著

戊戌变法史事考

且秦倉場郵傳部奏請
通商各國事務五大臣

存又奏保庶幾士熊希齡

清欽命總理各國事務五大臣
奉電寄

旨著陳寶箴傳知熊希齡

士聞普通武奏請設

存查羅長椅原呈篇幅較長

再行恭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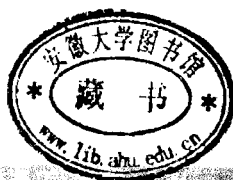
在覽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當臺頭

戊戌变法史事考

茅海建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戊戌变法史事考/茅海建著. —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5.1
ISBN 7-108-02195-1

I. 戊... II. 茅... III. 戊戌变法—研究
IV. K256.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2413 号

本研究项目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北京大学 985
计划的资助,并为北京大学“明清工程”研究丛书之一

责任编辑 孙晓林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36.25
字 数 520 千字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37.00 元

自序

北京，紫禁城，西华门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最近的二十年中悄然地发生变化。一方面是档案的整理工作有了进展，阅档的条件也不断改善，虽与世界各大档案馆相比尚有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其中的进步是可喜的；另一方面是阅档的人数在减少，平时很少见有专业工作者，每到寒、暑两假，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经常多于中国人。上个世纪被称为“三大史料发现”之最佳的“大内档案”，似乎不再光鲜夺目。

在这二十年中，清朝历史的专业人员在增加，每年毕业的硕士、博士更是成倍增长，而来此查阅清朝档案的人数却是相反，日渐减少。从拥挤到冷清，我虽目睹了阅档室的变化，但经常找不出此中的答案。

就我从事的专业——中国近现代史——来说，学科发展的轨迹是主题先行，很早就有了许多重要的结论。但这些结论所依托的史实却在匆忙中搭建，根基并不是很深。今天，年轻学生经常告诉我，他遇到的已有定评的“史实”经不起查证，往往是一考即错。对此我也有同感。在不可靠的“史实”之上，现在正运行着大量的推导、演绎、归纳，其结论也只能是不可靠的。学术发展到今天，我们的手中已经并不缺乏结论，相反的是，我们的思考却为各种各样互相对立抵牾的结论所累。其中一个大的原因，即为各自所据的“史实”皆不可靠。因此，到了21世纪，我个人以为，在我们这一专业中，最重要的工作似为“史实重建”。

史实重建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以时下的标准来衡量，投入与产出可能并不那么划得来。这只是从个人的短期的角度来计算，如果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可能正好相反。一位编辑朋友告诉我，最近几年中，每年中国近

现代史要出产数以百计的著作，数达千位的论文。这一数字让我震惊。谁都可以断定，这些著作和论文中的相当部分，几年后可能自然而然地消逝不显，那才真是一种极大的人力牺牲和物力浪费。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史实重建反而是投入少产出高。我目前的研究兴趣是戊戌变法，有两位史实重建的研究先进，一是黄彰健先生，一是孔祥吉先生。前者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著作中提出了巨大的假设，后者在 80 年代末的著作中做出回应。他们的成就经历数十年光芒不灭。相对于同时代诸多戊戌变法的研究，他们现在的产出价值远远高于当时的投入成本。

对于中国近现代史来说，最大的专业优势在于我们不缺乏史实重建的原料，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一千多万件档案，绝大多数未被学术界利用。现在阅档室有了空调，不收调档费，提供开水，代订午饭，中午也可以继续阅档，可人数为什么减少了呢？我不能肯定阅档室中的人数是否可以作为这一专业的方向风标，但可以肯定地说，阅档室人数的增加，一定是史实重建工作的加强。

1995 年初，在上海的一个座谈会中，我的同窗好友潘振平先生建议我研究戊戌变法。此时，我的前一研究项目即将结束，正开始寻找新的研究方向。三年后，到了 1998 年，我在完成前一研究的扫尾工作，按照潘先生的提议，进入戊戌变法研究的前期准备时，出席了两个纪念戊戌百年的讨论会。前一个会议在香山的一个寺院里召开，朱维铮教授说，时间过了一百年，但对维新一百天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仍旧不那么清楚。后一个会议在挂甲屯的一个宾馆中召开，会上关于戊戌政变的原因，各位研究先进再次发生了争论。当我慢慢浸入戊戌变法研究的深水中，我突出的感受是，相关的史实依然眉目不清。

五年多的时间，很快便过去了，我总算是做了一点点史实查证的工作。此次集结是为了做一个交待。

尽管人生已有多种际遇，但我在研究方面的运气实在太好。正当我决意研究戊戌变法时，1998 年 11 月恰有机会来到日本，使我看到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档案。日本学者的研究方法与手段对我是一个促动，京

都学派的缜密细心使我心向往之。随后我于1999年4月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一连三年没有发表论文,但在宽容的环境中我没有受到任何指摘,使我能够静下心来。2000年1月我又有机会去台湾,看到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的总理衙门档案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清代档案,在那里看档可以说是一种别样的享受。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各位师友更是为我提供极大的帮助。在研究经费上,我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北京大学社科部配套资金、985计划明清工程资金的帮助。2000年7月到12月,我在香港大学历史系访问。2002年11月至次年2月,我在剑桥大学远东研究系、巴黎高等社会科学学院访问。2003年8月起,我在东京大学文学部访问。域外客舍的宁静,又使我能够摆脱教务与杂务,潜心于百年前的故人旧事。本研究的最初档案整理工作是在香港完成的,其第五篇关于日本的论文,主体部分是在剑桥和巴黎完成的,其第三篇关于“上书”的论文,是在东京完成的。我写上这些相当私人化的流水账,是为了感谢在上述事情上帮助过我的各位师长友朋:张海鹏教授、卫藤沈吉教授、山田辰雄教授、徐辉琪教授、王天有教授、吕芳上教授、张启雄教授、陶文钊教授、P. Rorberts 博士、方德万(Hans van de Ven)博士、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ibre)教授、岸本美绪教授、并木赖寿教授、牛大勇教授、杜进教授、栢内精子女士……

感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诸位女士与先生,他们的热情服务使我很快地掌握了大量档案,其中朱淑媛小姐、李静小姐、葛会英小姐、吕小鲜先生、卢经先生等人帮助尤大。感谢曾对本书一些论文进行审查的研究先进:戴逸教授、杨天石教授、房德邻教授、潘振平先生、郭卫东教授、谢维先生、马忠文先生……他们的批评和鼓励对我是鞭策,毫无疑问,本研究的一切错误由我个人负责。感谢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历史系两个机构服务时关心照顾我的诸多前辈,其中最使我感动的是王庆成教授、曾业英教授、朱东安教授、何芳川教授,而何教授,我几乎从未与他说过话。

我时常怀念我的导师陈旭麓教授,他去世已十五年了。但在这十五年中,我能经常地感到他的存在,尤其是我遇到困惑、困境和困乏的时候。

这种情感是无法用感谢之词所能表达的。

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郑匡民先生。本书第五篇关于日本的论文是我和他共同完成的,双方的作用也是不分彼此的,但他大度地容我收入我的结集。当然,以后他结集时我也希望再收入。这一个丑媳妇可以更多地见公婆了。

茅海建

2004年1月于西八王子

目 录

自 序	1
-----	---

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

——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证、修正	1
-------------------	---

一、学术史与本文之旨趣	1
-------------	---

二、政变前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力关系	10
----------------------	----

事后报告制度 11 未送慈禧太后的个别重要奏折 18

慈禧太后似不掌握全部谕旨的原文 27 事前请示制度 29

从张荫桓弹劾案看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关系 36

三、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初三日的政治异动	39
---------------------	----

开懋勤殿与七月三十日给杨锐朱谕 39 八月初一日召见

袁世凯 45 八月初二日给康有为的明发上谕 60 八月

初三日参预新政军机章京“签拟”权力受限 65

四、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突然回西苑	84
------------------	----

杨崇伊的奏折与八月初三日晚慈禧太后决定明日回西苑 85

伊藤博文的觐见 92 八月初四日光绪帝移居瀛台非为囚禁 101 八月初五日上午光绪帝单独处理政务 106

五、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训政前后 111

八月初五日慈禧太后决定回颐和园时间推迟至初十日 111
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训政 115 袁世凯告密消息传到北京 125 光绪帝不认可“围园劫后”说 132

六、整肃与软禁 137

八月十五日慈禧太后决定不回颐和园 138 八月十九日杖毙太监 142 八月二十三日起光绪帝被软禁 149 九月初四日公布光绪帝病情 153

七、结论 161

附录一：百日维新期间军机处上呈慈禧太后重要折片 164

附录二：光绪二十四年正月至百日维新前军机处上呈慈禧太后重要折片 181

戊戌年张之洞召京与沙市事件的处理 186

一、徐桐的提议与清廷的用意 186

二、张之洞与总理衙门对沙市事件的处理 195

三、召张之洞进京的呼声再起 208

四、简短的结语 218

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研究 219

一、学术目的与方法 219

二、上奏权、代奏与上书的处置	222
代奏的规定 224 六月十五日以后的新规定与罢免礼部六堂官 229 “参预新政”军机四章京与上书处置方式的改变 237 慈禧太后的介入与新规定的取消 246	
三、上书的内容及其评价	249
清朝政府的制度病 255 激进、缓进与守旧 276 议会的概念与设置 285 西学与中学 292 铸币 300 税收与财政 308 农业改革 321 追求实效的具体建策 328 北京的道路河道修建 334	
四、简短的结语	340
附录：司员士民上书的时间、代奏及收藏状况	342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对外观念的调适	413
一、德国亨利亲王来华促动的清朝觐见礼仪改革	413
二、为德皇制作宝星与购置世界地图	428
三、亲拟致日本国书与召见伊藤博文	438
四、赴韩使节的派出	447
五、结语	461
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 (与郑匡民先生合作)	463
一、戊戌变法时期中日关系之背景	465
二、戊戌变法前期及高潮期日本政府的观察	468
目 录	3

三、戊戌政变后日本政府的观察与反应	482
最初的反应与大隈重信的态度 482 援救张荫桓 485	
援救梁启超 490 同意康有为赴日本 496 参加各国	
派兵北京的行动 505 援救黄遵宪 520 阻止废黜光	
绪帝 528 参与各国迫董福祥部甘军退出北京的联合	
行动 536	
四、山县有朋首相、青木周藏外相的态度变化	543
劝告清朝实行温和主义的行动被中止 544 援救文廷式	
的行动被中止 550 “礼送”康有为离开日本 553	
五、简短的结论	562
本书征引文献	565

戊戌政变的时间、 过程与原委

——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证、修正

一、学术史与本文之旨趣

1898年即光绪二十四年的戊戌政变，是近代史研究中的常青树之一，常议常新，有关论著连绵相继。其中的原委，首先是戊戌维新的核心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事后认定，政变的起因是袁世凯的告密，致使转变中国命运的改良不幸夭折。这一极具戏剧性的说法，受到了各类艺术家的欣赏，由其加之以实际上的戏剧化，广为流传，得到了普通大众的公认。而任何戏剧性情节恰又是严肃历史学家的生疑之处，由此引发了对康、梁说的一次又一次的否认或承认。其次，戊戌政变是密谋下的宫廷政变，处处可见其蛛丝，又到处让历史学家难觅确据。这使得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同时存在着多种结论，相互抵牾。如果将之放在一起，也让对此没有深入研究的人们（包括专业学术人员）一时难以判断。再次，由于历史学家的研究结论并没有广泛传播，而各种类型的著述（包括专业性的论著）涉及于此时，又多沿用康、梁旧说，且不申明其理由，致使历史学家觉得有必要再站出来进行证明。上述的原因，有学术性的也有非学术性的，但导致的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证、修正

结果是大量学术力量的投入和大量学术作品的产出。

然而,我以为,一个课题的学术研究到达了一定的阶段,就需要对该课题进行全盘的检讨,对其所存的各说从史料到论点一一进行学术上的核订,以达溯本归源之效。

如果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有关戊戌政变的研究,我以为,下列著述最为重要。^{〔1〕}

一、丁文江先生、赵丰田先生在《梁启超年谱长编》中称:“六日^{〔2〕}的政变是不是因为袁项城泄露了密谋才爆发的,还待考证,同时假定是他泄露的话,他在京师泄露的,还是在天津泄露的,或是在两处都泄露了,也不能说一定。不过我据各种材料的研究,知道他在初三日便从谭复生的口里听到了南海的全部计画,西后以初四日酉刻还宫,初五日德宗在召见袁氏以外,还延见日前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袁氏以上午返津,当日晚事件就爆发了。”“关于这次政变的原因,近因方面当然就是褫礼部六堂官职和召见袁世凯两件事,但是也有人说伊藤博文的人觐也是促成政变的一个原因。”^{〔3〕}丁、赵两氏的说法,当属排比当时他们可见之史料后的假设,而没有予以完全的证明。有意思的是,以后的研究大体是围绕着此一假设打圈子,走不出太远。由此可见丁、赵两氏对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说的客观态度和思维力度。

〔1〕 此处所提的学术史是指职业的历史学家以研究为目的的作品,以别于当时人或当事人的各种著述。

〔2〕 此处的六日即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公元1898年9月21日,由于当时的文献及有关研究大多使用中国纪年且又需要大量引用,为避免反复注记,本书前四篇以中国史料为主的论文使用中国纪年,并夹注公元,第五篇以日本史料为主的论文使用公元,并夹注中国纪年。

〔3〕 该年谱长编最初发表于1936年,其名为《梁任公先生年谱初稿》,编者署名为丁文江。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年谱的修订本,改名《梁启超年谱长编》。据该书由赵丰田所撰“前言”称,当时的主要编写工作由赵丰田操持,此说又由顾颉刚所撰“序”为证。我引用的是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本(并与1936年油印本核对),见该书第143页、第149页。

二、吴相湘先生于1957年发表论文《戊戌政变与政变之国际背景——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考订》下，认为戊戌政变的起因不在于袁世凯的告密，因为在此之前，慈禧太后一派已经行动。政变的起因是御史杨崇伊致慈禧太后的密折，而在其中伊藤博文访华是最要之因素。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吴文的论据并不充分，且引用的史料也未加严格核订，但参照后来的研究各说，吴文有其不小的意义。〔1〕

三、刘凤翰先生于1959年发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考异》，他通过对梁氏该文各版本的周密考订，认为修改之用意在于对“袁世凯戊戌告密史实的删改”，刘先生认为政变确因袁世凯告密而引发，并对前引吴相湘的论文提出挑战，指出其在引用材料中的失误。〔2〕1963年刘先生又发表《袁世凯〈戊戌日记〉考订》，认为其中的内容有真有假，指出袁世凯向荣禄告密系八月初五日下午，荣禄于当天五时即去京。同时还指出，袁世凯日记中关于初四日凌晨零时至初五日凌晨六时共30小时，“只字未提，实在令人怀疑”。〔3〕

四、萧一山先生于1963年发表《戊戌政变的真相》，提出了政变的背景，即“光绪帝要开懋勤殿议制度，设顾问团，聘伊藤博文为首席顾问，慈禧才着急起来，深怕他们借用外力，就立即发动政变”。“这是政变的真正原因。”“政变虽非纯由袁之告密，然而袁之告密则是政变的导火线。”他认为袁世凯在八月初三日听到谭嗣同的话后，即于第二天初四日变装回天津，密告荣禄，当日随荣专车回京，荣禄晋见慈禧太后，将袁言转告。初五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初六日，政变发生。萧一山先生提出政变原因为开懋勤殿与伊藤博文觐见，是有见地的，但其具体举证的材料为小说《续孽海花》。

〔1〕《学术季刊》（台北），第4卷第3期。此处据其论文集《近代史事论丛》，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78年，第1册，第123—150页。事隔40年后，吴先生再写《戊戌政变时的袁世凯》（《历史月刊》台北，1998年6月号），重申其先前的论点。

〔2〕《幼狮学报》第2卷第1期（1959年10月），本文作者所据是其于1964年改定本，并收入其文集《袁世凯与戊戌政变》，文星书店，1964年。

〔3〕《幼狮学志》第2卷第1期（1963年1月），此处据其1964年改定本，见《袁世凯与戊戌政变》，第139—189页。

关于政变的时间,文中也有两说,一是初五日晚上,一是初六日。此是萧先生在一次会上的演讲,文字上不严谨,也是可以理解的。^{〔1〕}刘凤翰先生于1964年发表《与萧一山先生谈〈戊戌政变的真相〉》,指出了萧先生该文“重要的错误与自相矛盾的地方就有二十几处”,最后提出其所认为的政变“真相”,其中最关键之点是,初五日上午光绪帝召见袁世凯时,示之密诏。袁于下午3时到达天津,即向荣禄告密,并示光绪帝给其之密诏。荣禄即乘下午5时车入京,当晚慈禧、荣禄、怀塔布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即刻刻训政,并命荣禄回津以候召命。初六日,垂帘之诏下。^{〔2〕}

五、黄彰健先生于1970年出版《戊戌变法史研究》,其中涉及政变的论文有多篇,最重要的是《论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黄先生认为袁世凯向荣禄告密为八月初五日,荣禄当日进京夜见太后是揣测之词。由于慈禧太后此时已移住西苑,初五日晚在颐和园召开紧急会议实为不可能。且初六日谕旨仅说康有为结党,不说康图围颐和园,而游说袁世凯的谭嗣同,初九日才被抓,于情理说不过去。黄先生认为,袁世凯的告密消息,系于初七日由杨崇伊转到北京,初八日慈禧太后方得知,于是有初九日黎明谭嗣同等人之被捕。而黄先生在《论光绪赐杨锐密诏以后到政变爆发以前康有为的正当活动》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即康有为嘱杨深秀上《请探查窖藏金银处所鸠工掘发以练兵急需片》,以挖掘金窖为词,建议光绪帝调袁世凯军300人入京;光绪帝很可能在初五日召见袁世凯时出手谕给袁世凯,让其派兵以挖金为由进京。在《康有为衣带诏辨伪》中,黄先生指出,第一次密诏于七月三十日由杨锐带出;第二次密诏于八月初二日由林旭带出。两次密诏康有为皆有改窜。^{〔3〕}黄先

〔1〕《大陆杂志》第27卷第7期,1963年10月。

〔2〕《文星》第77期,此处据其论文集《袁世凯与戊戌政变》,第191—230页。

〔3〕中研院史语所专刊之五十四《戊戌变法史研究》,1970年,台北。其中《论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一文,其注为1967年5月初稿,1969年5月二稿;《康有为衣带诏辨伪》一文,其注为1969年5月完成。关于调袁军入京挖掘窖金事,黄先生1988年发表《再谈戊戌政变——答汪荣祖先生》(《大陆杂志》第77卷第5期),称其已看到孔祥吉的论文《杨深秀考论》,但仍坚持其旧见。

生的著作发表之时，恰大陆的“文革”处于巅峰，该书大陆许多图书馆未藏，致使以后大陆的许多研究与黄先生多有重复。

六、周传儒先生于1980年发表《戊戌政变轶闻》，记录其当年在梁启超身边做学生时，所听到的梁对政变的说法，称光绪调袁世凯入京，当有引袁自卫之意，但无囚太后杀荣禄之旨；当时光绪帝的用意是派康有为南下，调黄遵宪入京，以作为缓冲。“事情之坏，坏在袁世凯一人，他不应张大其辞，以讹传真，陷害了光绪。”〔1〕周文虽不是研究文章，但对此事包含着梁的新说，也是很有意思的。

七、房德邻先生于1983年发表《戊戌政变史实考辨》，认为政变发生的时间为八月初六日，而政变的原因主要是杨崇伊的密折，袁世凯虽然告密，但此时政变已经发生，且袁世凯与荣禄都有保全光绪帝之心。而慈禧太后得知袁之密告后，于八月初七日下午下令捉捕谭嗣同；而光绪帝绝无密诏给康有为，其第一道密诏是给杨锐，与康氏无涉。第二道密诏很可能是口诏，是对八月初二日明诏严令康有为出京的抚慰之言。〔2〕房文的考证相当精细，在当时也是一篇全面之作，惜在《起居注册》上错引版本，且在谭嗣同被捕时间的考证上，证据与分析仍不充分。

八、孔祥吉先生于1983年发表《关于戊戌政变二三事之管见》，引用《卓尔该班档》、《穿戴档》、《知会簿》及台北故宫所藏《起居注》，证明现存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起居注册》为“经过缮改后的正式誊抄本”，而政变发生于八月初四日，光绪帝当晚在瀛台被软禁。八月初六日宣布训政，“是一切准备停当之后，走的一个过场而已”。而戊戌政变的导火索是伊藤博文的访华。〔3〕孔先生还于当年发表《杨深秀考论》，以其发现的《请探查窖藏金银处所鸠工掘发以济练兵急需片》，认为黄彰健先生的光绪帝有可能据此片调袁世凯军入京的推论并不正确。〔4〕

〔1〕《辽宁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2〕该文见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5—283页。

〔3〕《历史档案》，1983年第3期。

〔4〕《晋阳学刊》，1983年第4期。

九、杨天石先生于1985年发表《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引用其发现的毕永年《诡谋直记》，认定康有为有以袁世凯军人都围颐和园之谋，并让毕永年率百人奉诏执西太后而废之。^{〔1〕}次年杨先生发表《康有为戊戌密谋补证》，引梁启超致康有为信，再次认为康有围园捕后之谋，并称康、梁为隐其谋而订攻守同盟。^{〔2〕}同年发表的《光绪皇帝与康有为的戊戌密谋》，认为八月初五日，光绪帝最后召见袁世凯时，有密诏交给袁世凯，即光绪帝也参与了围园捕后的密谋。^{〔3〕}

十、汤志钧先生于1985年发表《伊藤博文来华与戊戌政变发生》，认为政变的导火索是伊藤博文访华。^{〔4〕}同年发表《关于光绪“密诏”诸问题》，对康有为的两道密诏进行考辨，认定系康氏之伪造。^{〔5〕}次年再发表《关于戊戌政变的一则重要史料——毕永年的〈诡谋直记〉》，将毕永年之说法与冯自由《革命逸史》一则记载相对照，认为毕永年的说法相当可靠。^{〔6〕}

十一、林克光先生于1987年发表《戊戌政变史事考实》、《戊戌政变时间新证》，根据《上谕档》八月初三日军机处奏片中“签拟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等语，认为八月初三日光绪帝已失去单独处理政务之权，即政变发生于八月初三日。林先生认为，政变的起因非为袁世凯告密；谭嗣同等人的被捕于八月初九日；六君子不审而杀是害怕外国的干涉。^{〔7〕}林先生的论文提出了重要的证据，然在当时及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未引起足够的注意。1990年林先生出版《改革派巨人康有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次阐述了这一论点。

十二、房德邻先生于1988年发表《光绪帝与“戊戌密谋”无关》，对杨

〔1〕《光明日报》，1985年9月4日。

〔2〕《文汇报》，1986年4月8日。

〔3〕《历史教学》，1986年第12期。

〔4〕《江海学刊》，1985年第1期。

〔5〕《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

〔6〕《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1期。

〔7〕《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历史教学》，1987年第3期。